

纪念经济体制改革十周年论文集

探索与选择

1978—1988

北京出版社

纪念经济体制改革十周年论文集

探索与选择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出版社

纪念经济体制改革十周年论文集

探 索 与 选 择

Tan suo Yu Xuan Ze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市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04,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00-00685-8/F·30

定 价 3.90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纪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周年，进一步贯彻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快和深化改革的精神，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于今年7月下旬联合召开了“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深入研究和探讨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的对策。

这本论文集所收入的十九篇论文，是从会议收到的近二百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这些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次研讨会上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工资与物价改革、企业改革等几方面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建议。

毋庸讳言，收入本集的论文，只是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这场伟大变革的探索和选择。从这本论文集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理论工作者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敢于突破传统的理论模式，积极运用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来分析和研究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种种难题，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我们相信，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一定会推动理论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同时也会推动各经济部门的实际工作。

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出版社、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和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表谢忱。中共北京宣传部的张兆民、张振华、卢东涛同志，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凌涛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	戴国晨 (1)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肖灼基 (13)
怎样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经济运行机制	卫兴华 魏 杰 (28)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约束与目标选择	韩小明 董克用 凌 涛 (45)
非均衡体系下的企业与市场	平新乔 (66)
* 价格改革：风险何在？化险为夷的对策何在？	
	马 凯 (76)
价格改革与价格总水平的宏观控制	陈嘉亮 (87)
农产品价格补贴在现阶段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苏小冬 (101)
试论社会主义工资运行机制的改革	文 魁 (115)
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罗欢镇 (128)
* 试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环节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选择与转换——一个非股份化的设想	林 岗 (157)
按商品经济要求完善承包制	北京市社科院承包制课题组 北京体制改革咨询研究中心 (170)

产权制度变革与承包制的完善·····	唐丰义 胡永明 (182)
论我国现行企业承包制的约束方式·····	王至元 (194)
经营权招标：企业改革中的重大创新·····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企	
业改革课题组·····	(205)
运用经济效益系数法 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	
·····李宗凌 刘松皓 (217)	
试论企业行为·····	王 宏 (228)
浅议投资体制改革与建设银行职能转变·····	谷 祥 (238)

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

戴 因 晨

一、改革理论从运行机制改革单线推进到与企业改革相结合的双线并举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已经经历半个世纪的探索了。早在三十年代面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活动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流寓国外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了价格制定中“错了再试”，使价格逐渐接近供求均衡价格的“兰格模式”。这是最早的但并未得到实践检验的改革设想。此后，在六十年代开始实践的捷克、波兰、匈牙利改革，以及为这些改革论证的奥塔·锡克、弗·布鲁斯、考斯塔等人的理论著作，他们都还是着眼于运行机制的单线改革，试图通过利用市场和市场机制来改善计划经济的运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但我们知道，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需要有相应的微观基础，这包括所有制形式、刺激办法和行为动力等方面的改革，以形成市场的主体。在这方面，南斯拉夫人率先冲破了把国家所有制作为公有制最高形式的框框，进行了以社会所有制的自治企业为内容的改革。但他们过分强调了企业自治对克服官僚垄断的政治意义，并没有注意从经济上把所有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衔接起来，出现了市场的紊乱、企业追求职工收入最大化的短期利益、投资仰仗于银行、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外债日益增多、宏观经济失控等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自觉不自觉地循着双线并举的道路推进的。当改革从农村起步时，并没有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传统框架内作简单的利益调整，而是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起点把中国农民推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从而推动了农村生产经营和经济运行的变革，推动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而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时，也不单纯着眼于运行机制的变革或所有制形式的改革，而是一方面培育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供需和合理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又着眼于所有制结构的改善，不仅在保持公有制主导地位前提下允许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存在，而且还致力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把传统体制下的企业改造成为新体制下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但也应该看到，在沿着这两条主线推进时，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没有形成对改革的总体设计的理论，尤其是对于新旧体制模式转换过程中如何处理这两条主线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相互衔接，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因此，侧重于单线推进的理论仍时时有所闻见。

二、对改革的两条主线的深层分析

改革之所以沿着两条主线推进，一般地说是因为在这两个方面都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出发进行改革。而从深层来考察，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客观必然。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并不是不相容的，而且还认识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以商品经济作为其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这在认识上应该说是极大的进步。

消除商品经济的理论前提，是假设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们利益完全一致，因而不需要等价交换。但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存在利益一致性的一面，也存在着利益差别性的一面。各个不同的产业部门及其职工，各个地区的居民，都分别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彼此之间只有通过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才能保证各自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消除商品经济的另一理论假设，是认为私有制造成资源的稀缺才需要商品交换。但事实上自然资源的开发能力受到生产力的限制，而且自然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因而通过商品经济的运动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便不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传统体制是旨在消灭商品经济的。在所有制关系方面，把整个国营经济当成一个大工厂或者当成“国家辛迪加”，忽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不承认企业和企业之间还要“亲兄弟、明算帐”，不承认企业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决策都由上级，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效果没有联系，形成“大家都姓公，核算有啥用”，“吃的大锅饭，何必细算帐”的局面。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是从上而下用指令性计划的方法，运用行政手段来组织的，国家不仅在总体上和全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而且把基层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等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都管了起来，它排斥市场，把流通问题变成了分配问题，按照“生产什么、调拨分配什么、生产多少、调拨分配多少”的方式组织经济运行，使得价格脱离了市场交换而只是作为核算的工具，长期冻结价格的后果是价格极度扭曲，难以衔接供需。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从深层来考察，也就是再造商品生产者和再造市场，从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转到培育和发展商品经济。

再造商品生产者和再造市场，正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必须的，但要实现有一目标，需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仍是把使用价值生产即实物生产作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而把价值生产即把商品经济当作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把发达的商品经济中的共同规律当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这样，我们即使已经认识到商品经济是当前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也仍然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认为商品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而仅是作为一种借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特定手段，并且迟早仍然要过渡到产品经济，这便会产生把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作为一种补课和过渡的思想，从而影响和束

缚我们的改革。只有把观念转变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模拟”市场而是实实在在的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变，才能冲破禁锢我们思路的种种束缚，推进我们的改革。

三、经济运行体制改革面临着双轨制前进还是绕开的选择

这几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如果回过头来，和十多年前的情景作一番比较，便会看到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和改革的目标相比较，则新体制的框架尚未形成，特别是经济运行尚处于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双轨制阶段。

我国原来的经济运行，是靠纵向的金字塔式的行政隶属系统的层层指令来贯彻的，它不需要市场，所以原来的市场发育程度很差。那时候，不仅只有商品市场没有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市场，而且商品市场也是半拉子市场，生产资料不进入市场，消费品市场也由于统购统销、统购包销、凭票凭证供应等把市场关系扭曲了。所以，一旦弱化行政的直接控制而转向利用市场机制，便会遇到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出现混乱现象，使得提高市场发育程度成为经济运行机制转化的重要条件。原先组织经济运行不靠市场，价格即使极度扭曲极不合理也能凑合过去，如今要使企业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运行，遇到的严重障碍便是价格的扭曲。因为一旦市场机制起到作用，扭曲的价格会形成逆调节，本来应当鼓励的因价格低而受到限制，本来应当限制的因价格高而盲目发展。造成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产业结构畸形发展。这样，由于价格极度扭曲，市场的培育便遇到障碍，经济运行机制便不可能一下子由行政协调方式转到市场协调方式，而是不得不采取分步推进的方式开放市场；有些部门和有些产品已经放开，其价格已经由供需关系在市场形成；而有些重要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则还没有放开，供需衔接还要通过计划调拨分配，价格还由国家制定，但又

允许企业把一部分产品自行在市场出售和按照市场价格成交。这样就形成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双轨格局。

双轨制的提出，是想以慢慢蠕动的方式逼近改革的目标，逐步理顺价格并且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体的新体制。但是，生活的现实却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价格还没有理顺而各种商品的价格却在轮番上涨，为了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抱怨，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来稳定价格。慢慢蠕动使人们产生何日是尽头的疑问，特别是刚有所理顺的价格又趋扭曲，形成治丝而棼、理不胜理。有的同志由此而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不会由于价格改革，而失败总是由于价格变动所酿成，于是提出了绕开价格进行企业改革，先让国营企业活起来的主张。而与此相反，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价格双轨制造成了经济活动的紊乱，使得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经济效益下降，并且两种价格差异为以权谋私者提供机会，因而主张加快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改革。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双轨并存格局，虽然以双轨价格作为其集中表现，但实际上则遍及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计划有双轨制，物资流通有双轨制，财政预算有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双轨制，劳动工资有受控制部分与不受控制部分的双轨制，……类此种种，随处可见。双轨制一方面是实际生活中各种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时妥协的产物，另一方面则和由来已久的“死一块、活一块”的板块结合的改革思路有着联系。这种“死一块、活一块”的板块结合，在一方是主体而另一方仅仅作补充的状况下矛盾并不突出，而当两者相对峙、相抗衡时便会产生剧烈的磨擦。而且当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此进彼退的关系时，这种板块关系在实践中很难加以结合。再从改革的目标来说，经济运行的双轨制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因为双重价格和双重运行机制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差别，总是会造成力度不同的矛盾和磨擦，使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因多方面的利益矛盾而难以结合。这也就是说，实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改革目标，是不能以双轨

制为基础的。要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既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又处于计划的调节指导之下，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需要致力于推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那末，竞争性的市场又何以迟迟不能形成呢？这是因为，从1985年以来经济增长“过热”的倾向未能遏制，几次“软着陆”都是着陆未稳便又起飞。当然，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矛盾来说，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保证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劳动就业逐步扩大，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工业发展速度要比发达国家高，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缩小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但这是指的长期的稳定的经济持续增长，这种稳定增长和推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是没有矛盾的。问题在于这几年存在着经济增长“过热”，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相伴生。双轨制正好是我国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处理供需矛盾的传统作法，所以还出现了双轨制的范围和所反映的利益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向。当存在通货膨胀而且通货膨胀率逐渐升高时，当然增加了理顺价格这一市场改革决定性步伐的难度。面临广大群众对于物价上升的责难，绕开价格改革的主张似乎有了依据。然而，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和理顺价格结构固然会使某些商品价格有所上升，但是这种物价上升是有限的而且可以在稍高的新水平上稳定下来，因而不是不需要绕开的。所以，提出绕开价格改革主张的实质，并不在于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先后次序的理论探讨，而在于为不放弃用通货膨胀支撑超越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寻找对策。

但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用通货膨胀来支撑的，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一般的通货膨胀转入惯性通货膨胀，使通货膨胀率由低变高。当通货膨胀超过低通货膨胀的限度（通常指一位数）时，便会寻致利益结构的紊乱，产生不正常的经济预期，促进囤积倾向，阻滞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效益下降。这样，出现高通货膨胀率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是高的，表面上的高增长速度也难以长期保持。当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高速发展受资源约束不得不刹车时，又往往出现经济发展的起伏波动，从长期看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因而，那种为了用通货膨胀支撑经济增长高速度而提出绕开价格改革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在经济运行机制改革所面临的选择中，只能是面对困难而不是绕开困难。既然困难的实质在于通货膨胀恶化了环境，克服困难也正在于下决心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控制投资规模，防止“过热”倾向，管住货币，为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最关键的价格改革创造好的环境，从而闯过难关，使我国经济转上以新体制为主的经济运行轨道。

四、企业改革面临着利益刺激与机制转换的选择

如前所述，历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多数人着眼于如何使运行机制转上市场轨道，对于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所有制则不想或者不敢去触动。这是因为，那时候的改革理论还没有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为目标，一旦明确了这个指导思想，重塑商品生产者和重塑市场主体的要求便会提上议事日程，改革也就很自然地会循着运行机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这两条主线推进了。

所有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改变过去那种要求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纯而又纯的状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从农村起步时，就把所有制关系以及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推上了改革的前沿。“包产到户”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实际上已经使农村所有制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一种集体所有制与个体所有制相结合的新的所有制形式，使农民摆脱“大呼隆”的劳动制度以及“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的困境，大幅度地实现了农业增产，开始了农业劳动向非农业劳动的转移。这种变革扩展到城市，个体经济也逐步发展，多年绝迹的馄饨担重现于夜市，蔬菜、水果、服装摊活跃和方便了城市生活，原来那些名为集体，实质上同样按国营管理的大集体企业，正逐渐转变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集体经济，随着对外开放，出现

了多种形式的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我国经济这些年来之所以生机勃勃,和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有很大关系,因为新萌生的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它们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这就使得市场发育壮大、日趋活跃了。

所有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众所周知,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并不是私有化,它仍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和主导。但国有企业不能够仍是传统体制下那种政企不分的、无经营和决策自主权的、不对自己盈亏负责任的企业,对于作为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使之具有充沛的活力,正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当企业改革起步时,针对着传统体制下对企业统得过死以及吃“大锅饭”这两项最明显的弊端,循着强化物质刺激的思路恢复了企业奖励基金制度,随之又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国家与企业共享利润的制度,企业从没有财权转到了享有--定的财权,从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到让出一部分利润归企业自己支配,企业比过去活了,积极性也比过去高了。由于我国长期把企业捆得死死的,加上连续二十年冻结了职工工资,从利益刺激起步应该说是历史造成的必然结果。问题在于,单纯的利益刺激并不能带来制度的创新,并不能实现机制的转换,基本特征仍旧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企业,政企不能分开,企业仍旧不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能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也形不成企业自我约束的机制。这就要求把企业改革从利益刺激向机制转换深化。

但是,在价格扭曲状况下,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关系使得企业利润畸高畸低甚至亏损,无法通过市场来检验企业的经营效果,无法使企业对自己的盈亏负完全责任。因而,企业改革实现机制转换的目标本来是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克服传统体制下企业所固有的种种弊病、使企业的预算约束由软变硬,而在价格扭曲状况下却做不到这一点。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进行价格改革的难度又很大,于是人们设想绕开价格改革来进

行企业改革，实行以企业前一时期盈亏状况为基数的经营承包责任制。这样做使得盈亏奖惩机制对企业行为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少企业的利润动机已经显著增强，自主权的扩大使得企业活了起来。然而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也硬化了企业的利益，使得下一步要进行的理顺价格的改革措施遇到障碍。因价格改革利益受损的企业，便要求变动承包基数或者允许企业用种种方式转嫁出去。同时，企业利益硬化并不等于企业财务预算约束硬化。在市场压力面前，地方仍然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原材料价格优惠、封锁市场保证销路、允许提高销价等等给企业以种种保护，尤其是双重价格的存在给父爱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企业仍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

所以，绕开价格改革所进行的以经营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仍然选择了利益刺激为主的思路。但是，减税让利所能给予的利益刺激受到国家财力可能的限制，一让再让尚属可行，三让四让就难以为继了。而这样改下来，企业的利润动机虽有所增强，使企业自负盈亏并把企业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的机制则未形成，这样便使得行为短期化的倾向极其突出，企业只能负盈不能负亏。有的同志认为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决定它天生的不能自负盈亏，要么仍旧是吃“大锅饭”的国有制，要么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或企业所有化。这个论断是从国有企业迟迟不能从利益刺激转向机制转换的表面现象得出的，是把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而未加梳理时的推论。这个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企业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但现在实行的承包制主要着眼于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又是在承认现状基础上的基数承包，实行承包过程中客观因素变化的风险责任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在承包过程中、以及在承包兑现时都可以进行讨价还价，企业发生了亏损仍旧可以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仍旧是软的而不是硬的，这当然会使某些人以为国有企业无法实行自负盈亏，也就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

商品生产者。但承包制是一种弹性很大的经营方式，它可以在政企不分条件下实行，也可以在政企分开、企业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条件下实行。所以分析问题要透过承包制的外壳，看企业内在机制有无发生变化。应该说在国有制企业财产组织形成仍旧保持旧格局的状况下，国有企业的内在机制改变不大，由国家统负盈亏的“大锅饭”也就难以真正打破。

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才能迈向商品经济。国有制经济在所有制性质不变的条件下，存在着财产组织形式变动的极大空间，因而，传统体制所存在的国有制经济内部产权关系模糊化的状况，有可能在国有制框架下通过产权关系重组而获得解决。在这方面需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的社会的行政管理职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这三种职能加以分解，把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独立出来，不再以行政权力的形式出现，这将是实现政企分开的必要条件。同时，需要通过必要的财产组织形式，明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两种功能不同的财产权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真正拥有对其所生产和经营的资产的占有、利用和支配的权利，改变随时可以放权又随时可以收权的状况，从而真正改变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从属关系。做到这几点，国有企业也同其它企业一样可以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独立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之中大显身手。

五、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与所有制改革是互为因果的连环套

以价格改革为主要方面的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和以企业改革为主要方面的微观基础改革，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连环套，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必须互相衔接、配套推进。不仅企业改革绕不开价格改革，价格改革也不可能单线推进。对于“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理解为价格改革不好，市场机制便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就尚未实现，这是有道理的；如果理解为只要进行了价格改革，便能一通百通，经济体制改革便能取得成功，这是一种误

解。价格改革不是孤立的，它要发挥效应，需要有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合。单纯地放开价格，是放不出一个市场来的。因为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方式转到市场方式，不仅仅是价格形成机制需要变化，而且要培育市场，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要有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劳动工资以及流通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因为价格终究只是市场运行的一个方面。而且市场机制要起作用，还要求微观基础即企业能够对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对于产出品价格的升降能够相应地引起供给的增减，对于投入品价格的升降也能够相应地鼓励节约使用和鼓励替代。如果企业财务预算约束是软的，价格变动可以相应地调整上交基数，那么价格改革的效应便不会如预想的那么大。因为归根到底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如果没有企业制度创新，仍旧存在传统企业的弊病，那末价格即使理顺了也达不到效果，理顺了还会再扭曲，放开了还会再收紧。

与此相同，增强企业活力需要通过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具有独立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但企业改革也同样不是一通百通的。企业改革正是为了使企业投身于市场，在市场的竞争与检验中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因而需要十分重视市场这个大环境的形成。如果市场的各种经济参数是扭曲的，那末成为独立经济实体后的企业的行为也将是扭曲的。这就不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取得好的经济效果。

市场和企业是改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企业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另一方面市场改革要以企业制度的再造作为依托。因此，不能够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单线推进，那样做不仅见效不大，而且有可能为继起的改革设置障碍。当前的改革已经从表层转入深层，从革除极“左”思潮所强加于经济工作的种种弊端转入制度创新，容易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不少，改革向深层推进的难度已越来越大，任何一方面的动作都会受到另一方面的牵制。但这并非意味着改革会旷日持久地拖下